



宏观经济管理文丛
HONGGUAN JINGJI GUANLI WENCONG



胡乃武◎主编

第四卷

当代中国 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FAZHANZHONG DE ZHENGCE XUANZE

 中国金融出版社

宏观经济管理文丛

(第四卷)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 政策选择

—— 胡乃武◎主 编 ——

杨瑞龙◎副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张志文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Dangdai Zhongguo Jingji Fazhanzhong de Zhengce Xuanze）/胡乃武主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3

（宏观经济管理文丛）

ISBN 978 - 7 - 5049 - 6820 - 3

I. ①当… II. ①胡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政策—研究—现代 IV. ①F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523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5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39

插页 4

字数 432 千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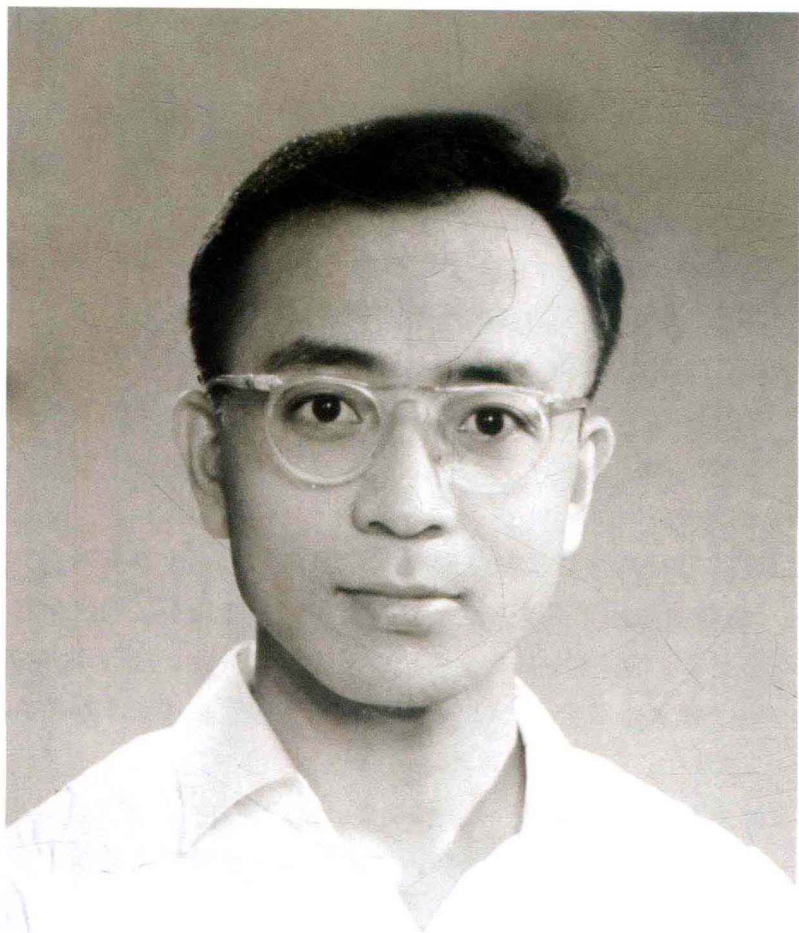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049 - 6820 - 3/F. 6380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胡乃武 1934年5月出生，山西文水人。1951年2月参加工作，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本科毕业，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应用经济学分会主席，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总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奖委员会经济学组组长等。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科研项目，出版专著（含主编、合著）3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科研与教学奖20多项。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2 年 10 月摄



1963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时摄

总 序

这本《文选》和这套六卷本《文丛》基本上反映了我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经济思想，并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兹简要阐述如下：

—

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先是从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出发的。可以说，这是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前提。围绕这个问题，我先后发表了一组论文，其中主要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79），“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9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特征”（1988），“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自负盈亏”（1980），“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1981），“按劳分配决不产生资产阶级”（1977），“社会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方式”（1988），“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1979），“社会主义与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1979），等等。通过我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研究和参加学术界的讨论，我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点：（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我国将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水平低、多层次、发展不平衡，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3）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无论是非公有制企业还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4）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5）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6）列宁的社会主义公式是：社会主义 = 公有制 + 按劳分配；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式是：社会主义 = （公有制为主体 + 非公有制经济） + （按劳分配为主体 + 非按劳分配方式） + 商品经济。（7）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8）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之后，如果经济体制问题解决得不好，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可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一个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9）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都表明，传统的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10）社会主义社会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经济基础不

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11)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地进行改革来加以解决的, 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 它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承认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 就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从而也就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12) 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必然会由国内贸易走向国际贸易,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所以, 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对外开放的社会, 闭关锁国就会停滞与落后。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十二个要点, 就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也是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总纲。

二

为了解放和发展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力, 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 我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探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 (1) 1979 年 4 月在无锡召开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研讨会上, 我提交了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的论文, 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 年第 7 期上。该文主要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 并从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要十分重视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 较早地按照商品经

济的要求粗线条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2)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于1987年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杭州市委党校《教学内参》1987年第7、8期合刊上。我所提出的这一改革思路,有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再造微观基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此,就要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和政企职责分开。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企业改革的过渡模式,股份制才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要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还必须建立企业内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机制。二是建立完善的、统一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即既要有商品市场,又要有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并要打破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状况,以利于开展公平竞争,力求形成供求大体平衡的市场态势。三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改变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由过去的直接管理为主改为间接管理为主。(3) 1987年,由我任主编,魏杰教授任副主编主持编写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虽然当时还没有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我们已经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来撰写这本书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教授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称赞这是“一项初步形成了一套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我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是比较早的,1977年我就参加了国务院政研室组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方法组”的工作,于光远任组长,董辅初任副组长,我是该组的主要成员之一。1987年前后的几年里,

我又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委托的任务——制定“1988—199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的工作。接受这一委托任务的有七个单位，它们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孙尚清、吴敬琏负责；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由刘国光、张卓元负责；中央党校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由王珏所长负责；北京大学，由厉以宁负责；中国人民大学，起初由黄达、胡乃武负责，后吴树青接替了黄达；上海市体改委等单位。国家体改委要求这七个单位都要提出各自的方案，并多次召开研讨会进行不同方案的交流和讨论，最后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向兼任体改委主任的李鹏总理进行了汇报。这项研究成果（包括“1988—199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和七个单位所提出的各自的改革方案）由沈阳出版社以《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从中受益匪浅。其中最主要的收获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了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开阔了改革的思路，总结和掌握了我国九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以下六条：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必须与经济理论的突破和观念的更新结合起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在经济理论上有所突破的结果。例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脱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否优越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

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以间接调控为主。与此同时，我们在全社会大大增强了商品经济观念、价值观念、利润观念、竞争观念和经营意识。所有这些经济理论的突破和观念的转变，大大推动了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再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的界限，抛弃了一切附加于社会主义之上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种种观点，从而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深入地开展，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使改革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如果经济发展“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势必造成社会总供求失衡，引发通货膨胀，从而使改革的回旋余地很小，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难以出台；相反，如果经济发展过慢，就会使财政收入减少，同样会使改革的回旋余地很小。因此，适度的经济增长是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发展要照顾到改革，要为改革留下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改革也要为发展服务，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技术进步，要考虑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

第三，把微观搞活、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微观搞活、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宏观管理是新体制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配套改革。

实践证明，这三方面的改革都不能孤立地单项突进，而应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相应地进行其他两方面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大的漏洞和管理上的“真空”，给改革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第四，近期改革目标必须与长期改革目标衔接起来。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能分阶段采取渐进方式来进行。这就需要把近期改革目标与长期改革目标衔接起来。近期改革目标要为长期改革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而不可将近期改革目标固化。例如，在我国企业改革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曾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只是企业改革的过渡模式，而不是最终目标模式，其最终目标模式是实行股份制。为了把近期改革目标与长期改革目标衔接起来，就需要制订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分阶段实施的改革方案。这些规划和方案，要有改革的理论依据、基本思路和定量分析等内容，并把它公开出版，使人人皆知，以便统一思想，协调改革步伐，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

第五，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中破与立的关系。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理论要超前，方向要明确，决心要大，步骤要稳。我们应该照此来处理改革中破与立的关系。片面强调先破后立，破是破了，而立又一时立不起来，就会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片面强调先立后破，势必推迟改革的进程，甚至使改革难以推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进行的，加之改革本身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所以改革要经历较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体制交替与并存的情况。为了避免因新旧体制交替而出现宏观管理上的“真空”，就要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在新体制覆盖

不到的地方，或者采取过渡性的管理办法去填补“真空”，或者暂时保留旧体制中一些可行的过渡性的管理办法，否则就会造成管理上的漏洞，使新体制的优越性不能显示出来，影响改革的声誉。出于这种考虑，暂时保留旧体制中的某些可行的管理办法，不能认为是保守的表现。

第六，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事实上，有些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连的。例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干部制度、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改革，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三

由于我所从事的专业是宏观经济管理，所以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侧重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早在1979年我在无锡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上所提交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题目就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不过，在这篇论文中，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以及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必要性。第二个阶段，我于1985年主编了《经济杠杆导论》一书，论证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当以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为主，并且阐述了税收杠杆和信贷杠杆等经济手段的调节功能。随后，我于1987年与吴树青教授共同主编了《模式·运行·调控》一书。在这本书中，专门设立了“调控篇”进一

步探讨了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模式，明确提出“计划机制调控所涉及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宏观经济总量和长期资源配置；市场机制调节所涉及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个量平衡和短期资源配置”。第三个阶段，1989年，我主编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这本书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来撰写的，在我国最早提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体系，具有超前性。第四个阶段，1992年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先后发表了多篇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论文，如“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与经济杠杆”等。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于2007年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民经济管理学》。这部教材，经过四年的试用，于2011年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并列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列教材加以出版。全书分六篇十九章，共48万字。第一篇总论：市场经济与宏观经济管理，第二篇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第三篇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第四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第五篇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第六篇国民经济核算与宏观经济模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学，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在全书的总论篇，论证了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二，它既分析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又强调了计划手段（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等）的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即它在宏观调控体系中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提供目标、起导向作用，这是其他调控手段所无法

取代的。

四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协调地快速发展，就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和制定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体系。这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实行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体系由以速度为中心向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实行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经济体制方面的转变，而没有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正确选择和转变，就很难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落到实处，也很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协调地快速发展，从而也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三十年来，实施追求高速度发展战略的结果，往往是欲速不达，“速度”虽然定的“很高”，但经济效益很差，人民得到的实惠很少，到“文革”结束时，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高达2.5亿人。

大家记得很清楚，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积极主张和大力推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及时制定和积极实施了我国现代化“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把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推进，这是很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这两个转变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实现

了温饱目标，2011 年我国的人均 GDP 已达到 5 400 美元，到 2020 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 100 周年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我们不仅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应当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鉴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设资金和人力资本短缺，技术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应当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而不应当采取大推进式的发展战略。此外，还要制定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于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先后申请和主持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来进行研究，收入这套《文丛》中的我所主编的两本书（《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和《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就是这两个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它们反映了我的经济思想，并且构成我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发展。这也是我专业范围内需要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

我对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研究是从总结建国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入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就是急于求成。这种情况，从“一五”时期的 1956 年就已显现，1958 年提出“大跃进”，一年之内就要实现钢铁产量的翻番，即从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番到 1958 年的 1 070 万吨；甚至提出苦战两三年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十